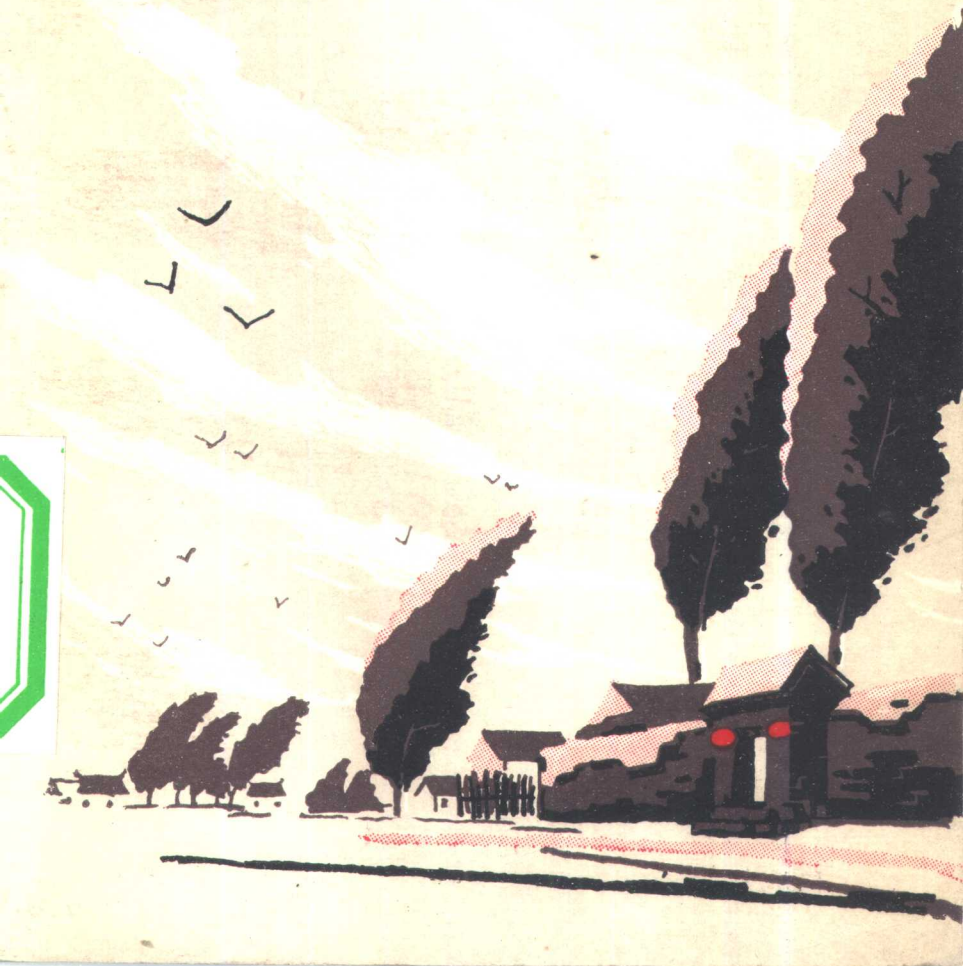


挂红灯

申 跃 中





挂 红 灯

申 跃 中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一 九 八 二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质朴幽默的笔调，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农村党支部率领群众与“四人邦”的势力进行英勇斗争的生活，再现了1976年的严重的历史真实，歌颂了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反抗恶势力的大无畏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

作品塑造了老硬、天凤，惠来和大腥油等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。语言明快，自然，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。

封面设计：王 燕 洁

挂 红 灯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房 山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188,000 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9 $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8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46,000

书号 10019·3252

定价 0.69 元

题 叙

有钱难买回头看。

沙河沿上大张庄的人们回顾起“四害”最猖狂的时期来，把一九七六年划了两道杠杠：说他们村从正月十二朱家聘闺女，门口挂了一对大红灯笼之后，就更加散了、乱了、糟了、烂了；到那年十月里“四人帮”垮了台，大张庄人为了欢庆胜利，又在大队部门口飘红抖绿地高高挂起了红灯，这个村子才又安定了，团结了，生产上去了，一切都逐步好转了。人们十分自然地把两次挂红灯之间的时期，看成是他们特别遭难的日子。

说起朱青、朱红的老妹子——县文工团员朱丽花与县委常委兼计委主任武世昌的结婚，确实大不一般。一匹红绸子，一头挽一个大绣球；一匹绿绸子，一头挽一个大绣球。一对七印锅那么大的红纱灯，挂在朱家大门口，真是悬灯结彩，光耀门庭啊！好家伙！院里高搭彩棚，一百二十桌酒席，狼烟地动的大小汽车来来往往，——这在大张庄婚聘史上，是亘古未有的大排场啊！

大排场就大排场吧！可为什么，为什么打那以后，大张庄人就倒了八辈子邪霉，把整个儿村子闹得孩不得睡，娘不得安，鸡飞狗跳墙，简直成了收不起、扫不净的一摊烂柿子呢？

还是让我们从头讲起吧！

第一章

一

在大张庄，最早知道朱家这门亲事的，是大队副支书孙惠来。那天下午，孙惠来到公社所在地李庄开会，公社代理书记高生把他叫到一边去了。

“喂，”三十多岁的代理书记高生十分秘密地对他说，“咱们武司令——武县委的媳妇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死啦？没听说呀！光知道瘫了二年多。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
“前天死的，昨天烧的。”

“噢！”孙惠来遗憾地说，“早知道，咱送个花圈呀！”

“别送花圈了，等着喝喜酒吧！”

“喝喜酒？找好对象啦？”

“傻蛋！前两年就……保密。”

“跟谁？”

“县文工团员，你们村的朱丽花。”高生咬着他的耳朵说。

“噢！——”孙惠来本来不大的圆眼睛笑得没缝儿了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孙惠来如获至宝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骑着车

子，飘飘然象腾云驾雾一般。他对于人称“武县委”的武世昌，从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就很熟悉。可是，自从人家当上了县委常委兼计委主任，成了县里的大人物头，就对自己不大理睬了。他也背地里骂过武世昌这小子不讲义气。可这一回，跟朱家定了这门亲事，朱家可要发旺了，大张庄也要发旺了，整个李庄公社也要沾光了。对于他自己，虽不能说是从天上放下了云梯，但也算是有了步步向上的台阶了。孙惠来眉开眼笑，正月里迎面吹来的寒风，也显得暖和多了。

他骑车子进了大张庄地界，远远望见支书张老硬在村东北面的废砖窑上和社员们平整窑坑。心想先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支书，以便对朱家的事有个一致的立场。可他又一想，不行。一来人家还没说什么时候结婚，叫保密；再说老硬这个人爱认死理，凿死犟子，一把手儿死拿。他的名字本来叫张石头。人们叫他石头老硬，就是因为他那个硬劲要是上来，你就是用九条牛拉，也休想使他回回脖儿。现在要是跟他说拧了，以后什么事都不好办。还是再找机会吧。反正得把话说全，说圆，说透。眼下，在这件事尚未公开之前，自己先给朱家办点好事，省得以后大伙都知道了，再去巴结人家，说咱是攀高枝儿。武世昌的死老婆昨天才烧，朱丽花跟老武的事肯定家里还不知道，应该先到朱家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。对了，赶早不赶晚，马上去朱家。

朱青、朱红除了能种地，还是手艺不错的瓦匠。春冬两闲，征得生产队的同意，常到市、县当临时工。他们第三生产队，一天叫他们交两块钱，给他们记十分工。哥儿俩总觉得队

里憋得太死，早有心把大、小队干部请上一席，要求放宽点。可是张老硬把干部们管得太严，又怕请人请不到，闹个大窝脖。所以请客的事一直没有吐过口。现在惠来进了村，一面朝朱家走着，一面考虑与朱家的关系。虽然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与朱红他们那个组织辩论过两次，但也沒有伤感情。孙惠来庆幸自己一贯会办事，沒有在什么事情上得罪过朱家。所以他兴冲冲地进了朱家大门。

正好朱青在家，一見孙惠来主动走上门来，便笑呵呵地说：“大兄弟！怎么今天走错门啦？”

惠来笑着说：“唉，一天价瞎忙，沒个串门的功夫。今天去李庄开会，天也快黑了，不值得再下地，抽空来坐坐。”

朱青忙把惠来让到屋里，沏茶、递烟，说道：“你不常来，我过年还剩下一瓶徐水原酒，咱喝两盅。”说着便吩咐他媳妇捅炉子炒菜。

惠来忙说：“别了，别了。就抽烟吧……”要是别的时候，惠来真不敢在这儿喝酒，因为老硬支书最恨干部吃吃喝喝，他说：“水大泡倒墙，酒大泡倒人。当干部的一闹酒，权就掌歪了。”可是今天，朱家的闺女已经跟县里掌大权的武县委定了婚，在这里喝酒不但丢不了权，相反，权会掌得更加牢靠。所以他嘴上虽在推辞，心里早有了底码，屁股也在炕上落了座。

朱青弯腰打开柜橱说：“惠来你放心，咱只是随便喝点，保险不求你解决什么难题儿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惠来吸着朱家的“前门”烟说，“朱青哥，你有什

么难题儿，尽管说，兄弟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
已经将手伸进柜橱的朱青听了这话，眼珠一转，便将摸到徐水原酒的手，挪到另一个酒瓶上，说：“哎哟，兄弟，你真有点口头福，咱还有瓶‘刘伶醉’呢。那天来了个亲戚，说喝没喝。”他把装璜完好、原封未动的“刘伶醉”放在惠来眼前说，“老哥求不求你甭说，你能有这么句话，俺就领情不过呀！”朱青又让媳妇多炒了两个肉菜。

一会儿，四盘菜上来，俩人开怀畅饮，大话小谈，一直到酒足饭饱，天黑之后，孙惠来才从朱家出来。

朱家的酒历来不会让人白喝的。这一回，朱青向惠来提出了一件事。说他去年秋后，让朱丽花绕了好几个弯（其实一个弯也没绕）托武县委，让他和朱红加入了本县大虎村（武世昌他们那个村）房工班，并拉上了张老硬的外甥李大万，去内蒙干了三个月的包工活。擦过年来，朱红已经又回了内蒙，朱青想自己带一班子人，当个包工头再去。但这必须从队、社、县办一个三级证明信，证明是集体组织的副业工，才是合法的。朱青没有说他已经 在李大万身上下了好大功夫，指望从他舅张老硬那里办封证明信，但一直未见成效。孙惠来见朱青那恳切的态度，心中一阵好笑：对面的朱青，如果知道他很快就要成为武县委的大舅子了，这么个小事算个屁！就是他张老硬不给开信，从哪个大队办不出封信来！当下，惠来表示十分热心，答应只要张老硬放一点活口，他保证一定办成。

惠来出了朱家门口，思谋着应该马上找老硬谈朱家的事。至于公社开会的事，倒无关紧要。可是自己嘴里吐着这么大

的酒气，让老硬闻到，首先就是个不高兴，朱家的事，怕也就不好商量了。干脆，明天一早再去找他。

二

鸡还没叫，张老硬一觉醒来，再也睡不着了。为了不惊动老伴，他没有拉灯，便从炕席上摸到烟袋、火柴，划火抽起烟来。黑乎乎的屋子，烟锅儿里一闪一闪地亮着，发出吱吱的声音。他的心里，也好像被什么烧着燎着似的，刚一醒就进入了烦乱的沉思。想起来，刚刚过的这个年，是他解放以后，过得最不舒服、最不痛快的一个年了。本来，年前腊八周总理的逝世，就够他心情不好的了。春节，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大方和儿媳妇莲芳带着宝贝孙子回家过团圆年，按说这该是合家欢乐、喜气洋洋的时候。可这天伦之乐和新春佳节，一点也没有减少他们对当前斗争形势的担心和忧虑。还有大队支委兼会计张天凤她丈夫韩顺，也从北京部队上回来了。大方、莲芳、天凤和韩顺，都是小学、中学的同学，这四个人到了一块，大半夜大半夜地谈个没完。他们对总理的匆匆逝世感到无限悲哀，强烈地指责那些野心家们对总理不怀好意，议论当前从教育界挑起的什么反击“右倾翻案风”。说明了吧，那话口儿都是对着江青、张春桥他们去的。那激烈的言词、义愤的语气、焦虑的神色、忧国忧民的情怀，使张老硬感到，这些比他晚一辈的孩子们居然懂得了这么多事。他们坦率的议论，都是关于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能不能继续下去的大问题。联系

起当前农村的一些情况，觉得孩子们说的都挺在理。好象这时他才发现他们确实是长成大人了。当然，他知道他们的谈话有很大的危险性，扣个不大不小的帽子，便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，反对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。所以在大方他们这三口子临走之前，总想嘱咐他们些什么话，可想来想去却找不到合适的言语。能不叫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吗？对一些坑国害民的事能默不作声吗？不，张老硬不是那样的人。直到送他们进了火车站，他还是按着他自己一贯作人的准则对孩子们说：“不论遇上什么情况，自己都要站得正，立得直，不能随曲就弯儿。”

儿子和媳妇睜大了眼睛，领会着父亲的教导。

现在，张老硬一连抽了几袋烟，心里烦乱地思索着。他从全国想到全地区、全县、直到全村。想来想去，就想到外甥大万这个混蛋小子身上来了。

大万是老硬唯一的外甥。自从姐姐前几年去世，大万结婚以后，一连生了三个孩子，队里分的虽然够吃够烧，可过日子大花小用，手头挺紧。老硬这边，儿子和儿媳妇在外边工作，老两口子出工没有负担，所以不断帮补大万他们一些。别看大万少言寡语，看上去是个闷头闷脑的人，心里还很有个算计。这两年学会了做木匠活，农闲了出去做阵子临时活，除了也按规定向队交钱记工，还能剩几个零花钱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去年秋后，大万竟没过来跟他舅舅说一声，就跟朱青他们哥儿俩跑了趟内蒙。过年回来，给老硬送来两瓶“竹叶青”，给他舅母买了个小羔皮袄。当时张老硬冷冷地望着大万送来的东西半晌没说话，沉了会子才问大万说：“你这几个月挣多少钱？”

“除了交队记工的，还剩七八十块。”

老硬算了一下，又问：“这东西都是用你的钱买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大万警惕地望着舅舅回答。接着，老硬又查问了他们怎么去的，给什么单位做活，工钱怎么算。大万虽是个闷头闷脑的人，但问一句答一句。有时就说自己只管做活，别的事不大清楚。老硬没查问出什么破绽来。虽说对外甥跟朱青他们出去，总觉得不大放心；但人家按规定向队里交款记工，集体和个人全没意见。至于外甥给舅舅买点东西，这是对老人的孝敬，本是好事。所以老硬也就没什么说的了。一直到前两天，听说大万在公家砖瓦厂买了两万块砖，说是要翻盖他的房子，老硬才马上捎信叫大万过来一下，——大万和朱青都是北头三队的，老硬住南头十队。可是两天过去了，大万一直不露面。昨天收工之后，也就是惠来在朱家喝酒的时候，老硬找遍了全村二十个生产队长，通知他们任何人都不准给大万派车拉砖。

他感到问题严重了。两万砖就得四五百元。朱青、大万他们随大虎村的班子去外地包工，三个月能挣这么多钱？大万不说实话，其中一定有鬼。朱青这小子把大万当一个手榴弹，冲他甩过来了。现在趁这个手榴弹还在冒烟、打转的当儿，必须马上捡起来扔回去，让它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爆炸。你大万不是不来吗？全村各队的拖拉机、大车，都不给你拉砖，我看你小子有本事到外村雇车！

天大亮了。老硬和老伴刚刚起来，便听外面有人敲门。老硬以为是大万来了，可一搭话是惠来。老伴把炕上地下拾

掇干净，老硬开门让惠来进了屋。冬日的曙光从东方偏南的方向射过来，一下子就把北屋照亮了。老硬和惠来坐在炕沿上，六十一岁的老支书和三十多岁的副支书坐在一起，从体形和面目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：老支书紧扎的白毛巾下露出花白的鬓角，长方形棱角分明的脸庞上，两只深邃的眼睛里闪烁着耿直的光芒，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农村那种偏头犟脑、脖子后头有拧筋的基层干部。那眉头上几道深深的皺纹，象在石头上刻出的一般。如果把这放大几万万倍，就象地壳由于年深日久的变动而形成的条条山谷。这个自小要饭、扛活，战争年代带领民兵打挑帘战、地道战的硬汉子，土改、合作化的带头人，时代的风雨怎不在他眉头上留下深深的年轮呢！他只是随便在炕沿上这么一坐，那长年劳动、肌腱发达的肢体，就显出一副匀称、坚实的骨架。这样的人，冬天穿多么厚，也不会使人感到臃肿；夏天穿多单薄，也不会让人感到精瘦。总之一句话，他浑身上下都给人一种方正和坚硬的感觉。孙惠来呢，眼是圆的，头是圆的，肩膀是圆的。如果他团在一起，就象个大圆球。随便滚到什么地方，遇上什么坡坡坎坎，都能轱辘过去。

孙惠来跟老硬谈了去公社开会的事。一谈工作，老硬就把大万的事丢在了一边，所以惠来觉得老硬的情绪还很正常。这才谈起朱家的事来。他说：“硬叔，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暂时可要保密。”

“什么好消息，那么保密？”老硬抽着烟淡淡地问道。

“武世昌的老婆死了。他跟咱们村朱青他妹子定了婚。”

惠来瞪大眼睛，只见老硬眼神动了一下，但并无惊喜的表示。他接着说：“这么一来，今后咱村里的事就好办了。有了朱家这个关系，买些农机呀，化肥呀，什么招工、考学呀，都好说了。”惠来说到这里，又沉了一会儿，只见老硬默默地抽烟，没有任何反应。他又继续说：“就是咱们自己，谁家也没挂着无事牌，往后有个大事小情的，那就只要一句话。”惠来不再说了，心中忐忑地等老硬开口。老硬在炕沿上磕了两下烟袋说：“唔，好处还不少呢！”

老天爷！你石头老硬到底开了口。刚才的惠来象是用铁棍撬一块八百斤的石头，撬了两下，纹丝不动，现在总算有了动静。他忙说：“好处多着呢。他这个常委是掌实权的计委主任，物资局、商业局、基建局、劳动局都在他手底下，在市里、地区也都有他的人。道行可大呀！现在趁朱家还不知这件婚事，咱先给他们办一两宗事，他朱家将来还能忘了咱们？”

“办一两宗什么事？”老硬从嘴里抽出烟袋马上问道。惠来就一口气儿说出了朱青要开三级证明信、想自己组织包工班子的事。只见老硬额头上的皱纹一下拧到了一起。

对于武世昌这个人，老硬耳朵里已经听得很多了。自打他从县粮食局一个一般干部升为县常委以来，武世昌的家乡大虎村和他的亲友，确实沾了大光。可老硬认定了这种人不能算共产党员，也不过一时得势罢了。将来总有个不光彩的下场等着他。去年县里开始整顿之后，听说几个重大投机倒把案件，都跟他有关，可是搞着搞着，后来又无声无息了。为这事，年前他找过县委书记王健。王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在这

个区的区小队里当指导员，老硬当时是民兵队长，所以说话也就直截了当。王健眉头紧蹙地说：“复杂呀！这几个重大案件不但跟武世昌有直接关系，还跟上边的人扯着尾巴挂着腮。不过这事情没算完，迟早要搞清楚。”现在，惠来一谈到朱青要当包工头，老硬就想到大万买砖的事。他对惠来说：“你知道最近大万买了两万砖的事吗？”

“唔，听说了。大万要不是去年跟朱青他们出去，他哪来钱买这么多砖哪！其实他们去内蒙，也是朱丽花托武世昌从中使的劲儿。”惠来眉开眼笑了，以为大万得了利，老硬就会向朱家靠拢。

老硬说：“不管谁使的劲，我已经通知各队：任何人不准让大万用车拉砖。我看他那买砖的钱来路不正。他出去才三个月，除了向队里交款记工，还能剩五、六百元买两万砖？我不了解别人，还不清楚他跳多高蹦多远！”张老硬语重心长地接着说：“惠来呀！咱们当干部的，说话、行事，都得心里有底，脚下有根！可不能事事都打顺风旗啊。他朱家聘他朱家的闺女，咱搞咱的社会主义。决不能就这坡儿上驴，往瞎道儿上跑。”

老硬几句话，给惠来那火炭一样的心劲，浇上了一桶冷水。

“算了，算了。”惠来脸上发红，心里泄气地说，“就算我没说，叫大风刮跑了。”

“刮不跑。我想朱家闺女结婚之后，想沾朱家这份光的人少不了。这种思想，台风也刮不跑。朱家这门亲事，还少不了

给咱们找麻烦。不信你看着。”

“唉！硬叔，说真的，你的原则性强，这点我佩服。可是，对一些具体问题，灵活性不够，这也是事实。什么事也得看看形势，只要对咱村有利，对集体有利，八面风都可以借。好事情到了咱家门上，何必装那份傻！”

“什么话？八面风都可以借？”老硬尖锐的眼光盯着他，质问道，“借了歪风就要压正气。借不正之风的甜食儿喂饱了的人，我就不信他能正儿八经的搞社会主义！当年日本鬼子的合作社，还在咱村里放过肥田粉呢。要是见奶就叫娘，那就可以当汉奸了！”他说着在竹炕沿上“咔咔”磕了两下烟袋。

老硬的话，噎得惠来没再还口。老硬哪是八百斤的大石头，简直是一座有根的山了。屋里沉默起来，只听到张大婶在外间屋拉风箱做饭的声音。沉了一会，惠来独自嘻嘻地笑了，说：“硬叔，说了半天还是你立场坚定方向明，我还得好好向你学呀！……”

老硬送走惠来之后，便在院里转起弯来。张大婶用烧火棍指划着他说：“方他爹呀！这回朱家可攀到了硬插杆上，你可得当心哪！惠来那脑瓜儿可转轴儿多，别让他给你带上捂眼，围着磨道转三遭，还不知是拿你当驴赶呢！”

孙惠来是文化革命前当小队会计时入的党，文化革命后才进支部。工作中确实有一套，不论大小事，只要群众找上来，办了办不了，准会叫你高兴，所以人们早就把孙惠来叫成“真会来”了。老硬早就发现惠来有办事圆滑和背后卖好行善的毛病，支部里批评过他，他也表示接受，几年来大问题也没

出过，所以老硬对他还是信得过的。可是他哪知道，在惠来内心里，对这几年靠投机钻营而升上高位的所谓“造反派”，早已垂涎三尺了。刚才的争论，使老硬总算是有了一点感觉。

老硬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最后他的眼光落到门口，冲着门旁那棵又高、又直的大榆树出神。

原来，五六年的时候，朱家入社不到半月又要退社。退社自由，退就退吧！朱青把车马赶回家去，还硬说高级社使旧了他的车，要半方木头修车；说他的马瘦了，要一百斤黑豆贴贴膘；还说农业社要是不给，就是打不完的官司。当时作为社主任的张老硬，在群众会上指名点姓地批评了他，说这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要拆社会主义的台。朱青听了，没等散会就奔老硬家跑去，解下腰带来，大嚷着要在老硬家门口那棵榆树上“挂干菜”。当时张大婶也在会上，家里只有八岁的儿子大方。大方没见过上吊的，吓得哇哇哭。正好老烈属张老同走过来，忿忿地说：“朱青啊！哪有你这么大喊大叫上吊的！夜深人静了才能吊死呢！”正在树上绑腰带的朱青，觉得脸上挂不住，就一头向老同身上撞去。只是仗着老同身子骨硬朗，才没被撞倒。这时会上的人赶到，把朱青拉回家去了。

老硬想到这里笑了，但笑容马上又收敛起来。觉得当时自己工作上也有点“左”，思想工作没做到家。现在呢，他预感到往后朱家的事，准比当年闹退社要凶得多。因为以后有了靠山，朱家的人决不会当个老实社员。凶就凶吧！该出事了，说书的拦不住。他回到屋里，刚要坐在炕上吃饭，大万来了。一见大万，老硬的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他一句话不说，从炕上下来，打

开红漆板柜，拿出大万年前送来的那件小羔皮袄和两瓶“竹叶青”，放在炕上说：“原封没动，拿走！”

大万从他们生产队长李见喜那里听说不让他用车拉砖，便傻了眼，知道到舅舅这儿来吃不了好汤水儿，可万没想到过了个大年皮袄未动，酒也一口没喝。他见舅舅愤怒的样子，呆呆地愣着。老硬大发雷霆地喝道：“拿着你的东西，滚蛋！”

张大婶过来劝老硬道：“你有话好好说呀，叫喊什么？”她又转过脸来，用手指头点着大万的脑门说：“唉！要说你这孩子，也是越学越胆大。平时一天来八趟，可去年上口外和这回买砖，这么大的事，你连气儿也不吭一下。别以为你鬼了，谁傻？要是中了人家的圈套，连你舅也得饶进去！你……唉！”

“少废话！”老硬火气十足地说，“咱不破他这昧心财！以后别登我这门边！拿着东西滚蛋！”大万没拿东西，一拧身走了。老硬忙把两瓶酒卷在皮袄里，从门口扔出去。大万连头也没回，径直走了。张大婶只好又把院里的东西拾掇回来，喃喃地说：“唉！真是。大清早儿就唱了一出文武带打的戏！”

三

惠来从老硬家出来，觉得自己碰了一鼻子灰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但一想到朱家，又感到甜丝丝的。吃早饭的时候，他望着老婆孩子们想道：大丫头今年该考大学了，房子也该翻盖一下。头年给老婆买了的确良裤子，她还嘟囔着要的确良褂子。当了这些年干部，不用说亲戚朋友，连自己的事也一样没办